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学 研究 文库

郑炳林 樊锦诗 / 主编

巴中石窟研究

# 巴中

石窟研究

雷玉华  
◎ 著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 巴中

雷玉华◎著

# 石窟研究

敦煌学研究所

郑炳林 樊锦诗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中石窟研究/雷玉华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3  
(敦煌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105-11452-8

I. ①巴… II. ①雷… III. ①石窟—研究—巴中市  
IV. ①K87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6385 号

策划编辑:虞 农

责任编辑:王 欣

封面设计:刘家峰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mzpbs.com>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330 千字

印 张:11.75

定 价:30.00 元

ISBN 978-7-105-11452-8/K·2212(汉 111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 敦 煌 学 研 究 文 库 ◆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研究院 编

主编 郑炳林 樊锦诗

编委 方广錕 邓文宽  
张涌泉 罗世平  
郑阿财 郑炳林  
赵和平 郝春文  
荣新江 樊锦诗

编务 冯培红 魏迎春

## 前 言

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是一种重要的宗教文化遗迹，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开凿石窟寺和造像的传统也传到了中国，并且影响了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一千多年以来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重要文化遗产。在分布范围上，中国是世界上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分布最广的国家，在数量上亦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在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中，有五处是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sup>①</sup>。在公布这五处世界文化遗产之前，北方的三大石窟寺敦煌、云冈和龙门早已是中外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遗迹，与之相关的河西、陕西等北方地区的石窟寺也引起了中外学者们的重视，研究成果丰富。而南方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却少有人关注，有的学者甚至在很长时间内不知道南方有丰富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对南方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的研究也相当薄弱。

实际上，我国南方有极其丰富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其中数量最多的当数四川省。四川盆地周围的山地上分布着大量的佛教和道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中，列出

<sup>①</sup> 这五处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是：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乐山大佛、大足石刻。其中前三处是石窟寺，乐山大佛为摩崖造像，大足石刻是石窟寺与摩崖造像均有。

的一千多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几乎占四川野外文物点总数的十分之一，还有众多的小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点未被列入其中。因此，就数量而言，四川是当之无愧的石窟寺大省。四川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的开凿始于南北朝时期，但其最重要的阶段却是唐代中晚期及其以后。唐代天宝年间，大规模开窟造像在中原北方地区结束，而在四川则方兴未艾，直到南宋时期还连续不断，将中国大规模连续开窟造像的时间向后延续了五百年，其晚期窟像填补了中国石窟寺开凿史上的空白。同时，四川安岳县与重庆大足县区域的密教造像是目前中国佛教史上绝无仅有的系统的密教造像。由于过去交通困难，绝大多数四川石窟寺和摩崖造像不为外界所知。随着学术的繁荣和四川交通状况的改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四川。但是，比之于中原北方地区，四川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无论是在基础资料的整理上还是在各方面的研究上，都远远落后于北方地区。

## 二

现代学术意义上最早对四川石窟和摩崖造像进行考察的是法国人色伽兰等，他们于1914—1917年对广元、绵阳、夹江、乐山等地的佛教摩崖造像进行了考察和记录。建国初，广元、乐山、大足等少数地方的雕刻有零星的调查资料发表，少数规模大、保存状况好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如广元千佛崖、皇泽寺等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四川省在这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大量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许多地方建立了文物管理所或文物保护点，对这些文物进行看护，之后几次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点多是在这次普查中发现的。8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丁明夷先生带着一些学生开始对四川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进行调查，他们希望能够全面、系统地掌握四川的资料，进行科学的研究。他

们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还为四川省有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的几家基层文物管理单位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文物工作者。但四川省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地点太多，数量太大，由于交通、经费等条件限制，他们最终没能完成全部的调查。与此同时，四川社会科学院的胡文和先生凭着个人的执著和热情在四川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并发表了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各地文物管理所也渐渐开始调查和整理辖区范围内的资料；一些国外学者也开始注意四川的造像资料，但由于很少有实地调查的机会，故缺少准确、系统的资料发表，研究非常有限。

### 三

1995年，在成都市西安路发现了一批南朝佛教造像。在整理这批造像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四川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的研究状况，很想对四川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建立起四川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的年代序列，为研究者们提供最基础、最完整的资料。2000年，终于有机会开始工作了。我当时计划分区分批进行调查，从四川最早开窟造像的区域川北开始，然后是川西、川中、川东、川南，最终形成系统的考古调查报告。当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姚崇新博士来到四川，他希望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我们先从川北开始。

很快，我发现了自己的计划很不现实，首先是交通极其不便，很多地方我自己一个人根本不能到达。其次，有的窟龛在几十米高的地方，几十步高的梯子根本够不着，况且很多地方离人家很远，连梯子也找不着。其间，我发现由于四川面积很大，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前后延续时间很长，东西南北差异很大，不可能一次完成所有地方全部窟龛的调查工作，也不可能一次解决一个地方所有的问题。姚崇新博士确定了以广元石窟作为他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因此他在巴中调查了一段时间后，把重心放在了广元，而我自然把重

心放在了巴中。两年以后，我将《巴中石窟研究》确定为我的博士论文，而且把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隋唐时期，这样可以集中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调整工作思路以后，工作进展顺利多了，不到一年，就完成了对巴中的初步调查。后来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我又去复查和抄录铭文、有选择地画图、逐龕逐像校对和拍摄，每一个地点至少要去三次。工作极其烦琐，且不说要求考察者有足够的耐心，体力与胆量也是必须的，因为在深山里寻找窟像，长途跋涉与工作需要体力，面对野狗、蚊虫、蛇以及在悬崖上工作则需要胆量。由于目标明确，工作有针对性，比起最初的心情轻松多了。最终，经过将近六年的时间，我完成了这篇论文的写作，其间也发表了一些阶段性的调查和研究成果。本书图片均由我本人拍摄，线图由卢引科绘制。

十一年后的今天，由于西部的迅速发展，交通状况日新月异，当年从成都出发需要两天一夜才能到达巴中，中间还须在广元住一晚，现在四个多小时就到了；当年要翻山越岭才能够到达的农家院子，如今早已因四川省实施“公路村村通”工程而修好了水泥路；当年湮没在杂草丛中的佛像们，如今整整齐齐地呈现在佛龕中，有了专门的看护人。

这本书只是巴中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研究的一个开始，便利的交通一定能引来更多学者对巴中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的关注，西部的建设与发展必将带动文化与学术的繁荣。

作者

2010年5月



## 说 明

1. 笔者在巴中开展调查时，先从巴中城边的南龕开始，依次调查城周的北龕、西龕、东龕，之后出城，在城以东方向、以南方向、以西方向进行拉网式调查，本书在写作时也按此顺序进行。每处窟龕编号均以巴中文物管理所编号为准，对原来漏编的龕窟进行补编，并做了补编说明。

2. 20世纪90年代至今，因当地行政建制变化太大、太多，本书中，凡巴中石窟分布地的名称，均用笔者2000年调查时的名称。

3. 本书的文字描述部分，造像组合仅包括主尊、胁侍和圆雕或高浮雕出的天王、力士护法像，不包括浅浮雕于窟龕顶部、外侧壁面、主要造像后面的飞天、天龙八部、供养人，龕前及主尊座侧的狮子、狮奴等。

4. 本书在描写窟龕方位或窟内雕像方位时，“左”、“右”均以龕中正壁主尊之左右为准。

5. 本书所录铭文，“/”表示提行，“□”表示原字已不清楚，“□”中的字表示系根据残痕推测出的文字，“……”表示风化后字数已不清楚。留出的一字或多字的空格，表示铭文中有空格。没有提行符号的铭文，系因其所在崖壁位置太高，笔者无法上去抄录，故引用原巴中县文物管理所的存档资料，而存档资料中没有提行符号所致。

6. 崖壁范围和极少数大型窟像以“米”为单位记录，一般龕、像均以“厘米”为单位记录。

7. 本书引文，凡铭文与碑刻用5号仿宋字体，其他引文用5号楷体。

#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的原因	1
二、相关研究成果	4
三、研究过程与方法	7
第一章 巴中石窟的分布	9
一、巴中的地理位置与建制沿革	9
二、巴中石窟的分布	10
第二章 代表窟龕及其排年	16
一、南龕	16
二、北龕	67
三、西龕	83
四、水宁寺	110
五、兴文沙溪	129
六、石门寺	132
七、三江	137
八、玉井佛尔岩	144
九、恩阳	146
十、麻石垭佛尔岩	149
十一、其他	151
第三章 巴中石窟的类型、分期和年代	155
一、窟龕类型	155

二、造像内容及组合·····	172
三、窟龕类型和造像组合的演变·····	172
四、分期及年代·····	177
<b>第四章 巴中石窟部分题材的初步研究</b> ·····	187
一、西方净土造像·····	188
二、菩提瑞像·····	207
三、毗沙门天王像·····	231
四、地藏造像·····	242
五、如意轮观音像·····	260
六、双头瑞佛像·····	263
七、天龙八部像·····	265
八、道教造像·····	267
<b>第五章 巴中石窟的渊源与历史背景</b> ·····	277
一、巴中石窟与周边石窟的关系·····	277
二、巴中石窟的特点及其渊源·····	301
三、巴中石窟与历史交通之关系·····	307
四、巴中石窟兴衰的历史背景·····	320
<b>结 语</b> ·····	333
<b>附 录 巴中石窟各龕分期参考表</b> ·····	336
<b>主要参考文献</b> ·····	359
一、古籍及碑志·····	359
二、现代文献·····	360
<b>后 记</b> ·····	366

## 绪 论

### 一、选题的原因

石窟又称石窟寺，是一种重要的佛教遗迹，是研究佛教艺术、佛教史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实物资料。佛教在中国连续发展约两千年，在全世界，无论是从分布范围还是从数量上看，中国现存的石窟都是最广、最多的。国际学术界已共同认识到，研究中国历史，就不能不研究佛教，研究佛教就离不开中国的石窟。学术界对中国佛教石窟的研究不可谓不多，成就不可谓不丰，然而，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了零星的简报或一些专题研究的补充材料涉及中国南方石窟外，鲜有关于中国南方石窟的系统研究，尤其四川石窟，许多基本情况尚不清楚。

四川地区（在地域上包括今重庆市）是中国南方石窟最多、最重要的区域，其绝大部分是摩崖龕像，只有少数深广者稍可称“窟”，统称之为“石窟”是不科学的，准确的称谓应当是“四川石窟和摩崖造像”，但因人们习惯于称其为“四川石窟”，故本书沿用此旧称。我国南方除江苏、浙江、云南等地区有少量的石窟和摩崖造像外，其余众多的石窟和摩崖造像均集中在四川地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四川石窟可以代表南方地区。同时它又是在唐代北方大规模开窟造像结束之际兴起的造像区域，大规模的开窟造像直到南宋才结束，把中国成片开窟造像的历史向后延伸了近五百年（从8世纪末龙门造像基本结束至13世纪南宋大足造像，个别的、零

星的开窟造像除外), 直至明清时期还有不少开窟造像。现存的四川石窟及摩崖造像数量大、分布广, 据不完全统计, 至 21 世纪初, 仅笔者作过全面调查的巴中地区即有唐代摩崖造像地点十九处, 还不敢保证完全没有遗漏, 因为在最近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又发现了唐代摩崖造像; 成都市的蒲江县现存的有唐代龕像的地点有 18 处以上; 据安岳县文管所资料统计, 其辖区的文物点有 72 处, 其中绝大多数与石刻造像有关; 大足县的各级文物保护点有 75 处, 绝大多数都是石窟和摩崖石刻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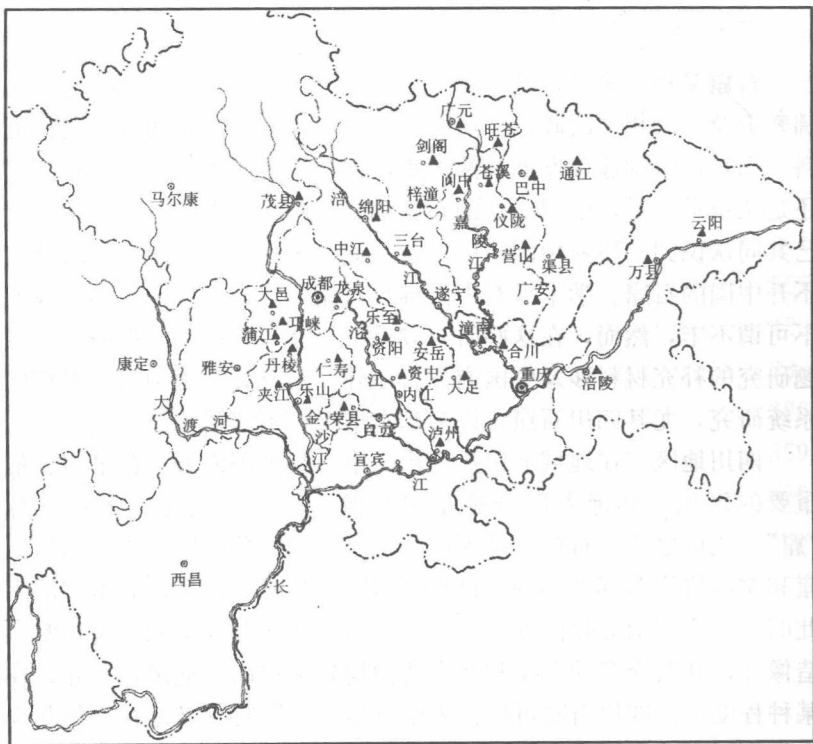


图 1 四川石窟分布示意图

根据造像的时代和特征，可将四川石窟分为特征相对明显的几个区域：川北、川西、川东（见图1）。川北区以广元和巴中为代表，实际上可分为两个小区，与巴中紧邻的通江也有多处摩崖造像，从造像风格和地域上看，与巴中实属同一区域。从巴中向南至成都沿途的阆中、旺苍、苍溪、仪陇等地的造像与巴中更接近，从内容和特征上看，都属于川北巴中造像区。广元区包括广元的千佛崖、皇泽寺和观音岩。川北地区的广元、巴中及其周围的石窟开凿时间早，与北方石窟关系密切，已形成四川石窟的一些特征，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四川开凿最早的北朝石窟。川西区是指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盆地周围地带，在广元和巴中造像区以南，主要指梓潼、绵阳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绵阳、乐山、夹江、仁寿等四川盆地周围的广大区域。它们代表四川腹地的石窟和摩崖造像，最具四川特色，始凿于隋末唐初，盛唐造像较多，更重要的是有一批中晚唐到五代的摩崖造像龕和大佛像。其中又可分为几个小的区域，如梓潼、绵阳区，成都周围及其以南的乐山、夹江区，成都以东的内江、资中地区等。川东区指以大足、安岳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和重庆地区，这个区域的造像分两种，一种与四川西部的造像相同，另一种为宋代兴起于安岳和大足地区，曾被一些学者称为“柳氏派”的密教造像，其中也可以分为几个小的区域。这几个区不是绝对分开的，它们有许多共性，是一个整体，只是各自又有一些特别突出的特征。各个区域造像的共同特征就是一般都沿江河两岸或在古道旁边开凿。

综上所述，四川石窟在中国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南方石窟的重要代表。巴中和广元地处川北，是川北之门户，又是四川石窟最重要的分布区，它联系着四川与中原北方地区，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石窟造像经过川北的巴中和广元传到全川，甚至传到云南，并在四川和云南等地得到继续发展。系统研究川北石窟是研究四川石窟的关键。北京大学姚崇新博士已对广元石窟作过分期研究，他的研究使四川石窟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对巴中石窟仍然

缺乏系统研究，因此，笔者选择巴中石窟作为研究对象，以填补此空白。

## 二、相关研究成果

据笔者所查，在我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巴中南龕造像的记录始见于南宋。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187《碑记》中引的《南山记》即是南龕第 137 号龕唐代中和四年（884 年）尚书右臣张祜的造像铭文。明代杨慎编《全蜀艺文志·巴州碑记》中有《唐古佛龕石刻》和《唐严武乞赐山南寺表》，其中《唐古佛龕石刻》后注曰：“在城南二里，有大书石刻，载唐乾元三年山南西道严武奏：‘臣顷牧巴州，其州南一里有古佛龕旧石，镌五百余佛，望特赐洪名。’敕以‘光福’为额。”《唐严武乞赐山南寺表》后注曰：“乾元三年”。从《全蜀艺文志》中这两则记载看，原来南龕山名南山，其山上有寺，严武奏表刻于石上，又有古佛龕石刻，且其内容略与现在刻于南龕云屏石上之《严武奏表碑》<sup>①</sup> 铭刻有异，故二者似乎都不是现存的铭刻。<sup>②</sup> 又明代曹学佺的《蜀中名胜记》<sup>③</sup> 卷 25《巴州》条有：“南龕，有广福寺，《志》云唐时建有乾元年间契书，《碑目》云唐古佛龕石刻，在城南二里，大书乾元三年山南西道严武奏：‘臣顷牧巴州，其州南二里有古佛龕，旧有镌佛五百余，伏望特赐洪名，敕以光福为名’”。不过此二书均是因南龕胜境而录其碑，对南龕的造像没有更多的记录。对巴中摩崖造像中造像铭文进行较多记录的是清代的金石学家们，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

① 《严武奏表碑》：指刻于南龕山前云屏石上乾元三年之题刻，俗称《严武碑》或《严武奏表碑》。其录文还见于以下古籍，《金石苑》卷二题为《巴州佛龕记》，《八琼室金石补证》卷五十九题为《巴州光福寺额敕》，《十二硯斋金石过眼录》卷十二题为《巴州古佛龕记》。

② （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卷五十二，1608～1611 页，北京，线装书局，2003。

③ （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燕庭的《金石苑》<sup>①</sup>、光绪元年（1875年）汪鋈的《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sup>②</sup>，以及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才刊印的清人陆增祥之《八琼室金石补证》<sup>③</sup>等均录有部分巴中造像铭文。其中《金石苑》收录的最多，有十条，此外还收录了十多条宋人题词，造像铭文录文后面还对部分造像人物进行了简要的考证，民国时期编修的《巴中县志》中有关碑文多是从其中引出。其所录之造像铭文现在大多还存有遗迹，有的还保存较好，但有些很重要的铭文已经风化很严重了，如张祜造像铭，今已全部磨灭，只能看出原来刻文的位置；而其碑录中的宋人题刻部分则大多已被毁坏，今天只能从其录文中看到。今存之《严武奏表碑》刻于南龛山前云屏石上，保存完整，字迹如新，与前述明代记录略有出入，不知是否后来有过翻刻，但今存之铭刻与清代《金石苑》录文基本相同，由此可知，若有翻刻当在明清之间。

最早对巴中摩崖造像进行调查的是1914—1917年由三个法国人（色伽兰、法占、拉狄格）组成的中国考古调查团，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调查陕西的秦汉陵墓、四川的汉代崖墓、汉代石阙及佛教遗迹。他们对广元、巴中一带佛教遗迹进行调查的资料部分收录于1923—1924年出版的《中国考古调查团图录》中，其中有关于南龛的部分记录。<sup>④</sup>

较重要的调查是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文物普查。这两次普查对四川许多重要石窟点都做了初步的建档保护工作，并发现

①（清）燕庭：《金石苑》，《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

②（清）汪鋈：《十二斋金石过眼录》，《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

③（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④《中国考古调查团图录》，[法]色伽兰、法占、拉狄格著，法文书名为 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e (1914 et 1917) Atlas, 法国巴黎格特纳书店，1955。其中文译本《中国西部考古记》（冯承钧译）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第二卷收录了88幅有关佛教遗迹的照片，是笔者所见与四川佛教遗迹有关的最早的照相记录。



了多处造像，在多处重要地点建立了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我们今天得以知道这些窟龕的重要原因。其中 50 年代陈明达的《四川巴中通江两县石窟介绍》<sup>①</sup>，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介绍巴中石窟的文章。进入 80 年代，开始调查和研究巴中石窟的人渐多，较重要的调查有四：

其一，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丁明夷先生带领学生在川北的调查，其成果见《文物》1990 年第 6 期。主要有：丁明夷的《川北石窟札记——从广元到巴中》，马彦和丁明夷的《广元千佛崖石窟调查记》和《广元皇泽寺石窟调查记》，罗世平的《千佛崖利州毕公及造像年代考》，邢军的《广元千佛崖初唐密教造像析》等文章。

其二，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国内一些学者个人的调查。顾森先生对巴中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巴中南龕摩崖造像形成年代初探》<sup>②</sup>，对南龕造像进行了分析，认为南龕造像始凿于初唐。四川的胡文和先生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对四川石窟进行全面调查，也调查了巴中石窟，他的成果主要见于 1994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sup>③</sup> 一书中。

其三，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外的一些学者也有零星的调查和研究。如美籍意大利人安吉拉 (Angela F. Howard)，她是中国对外开放后最早到四川调查佛教造像的外国学者。她写有《未知的和被遗忘的盛唐佛教雕刻》 (*Tang Buddhist Sculpture of Sichuan: Unknown and Forgotten*) 等介绍性文章。<sup>④</sup>

① 陈明达：《四川巴中通江两县石窟介绍》，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 (5)，102 页。

② 顾森：《巴中南龕摩崖造像形成年代初探》，载《美术史论丛刊》，1983 (2)，111~113 页。

③ 胡文和：《四川佛教道教石窟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④ ANGELA F. HOWARD. *Tang Buddhist sculpture of Sichuan: Unknown and Forgotten*. *Bulletin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88 (60): 1~164.